

顽固派的赌咒发誓靠不住

——从苏轼的“忍”与“吼”谈起

黄 刚

北宋时的苏轼，是反对当时的改革家王安石变法的顽固派头目。他有几句“名言”，曾经被叛徒、卖国贼林彪录制成条幅，当作座右铭：“匹夫见辱，拔剑而起，挺身而斗，此不足为勇也。骤然临之而不惊，无故加之而不怒”；后面紧接着的一句是：“此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”。这几句话出自他的《留侯论》，原意是告诉那些怀抱有野心的大人物，当自己暂时处于不利情况时，要装出“不惊不怒”、逆来顺受的样子，避免过早的暴露，练就一身“忍”字的功夫，这样，才可能“忍小忿而就大谋”，成就反革命事业。

苏轼自己就很有些“忍”的功夫。本来，他对王安石及其变法主张是深恶痛绝的，咒骂王安石是“未可大用”的“小人”，攻击新法“小用则小败”、“大用则大败”。但是，当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雷厉风行地推行新法时，他本能地感到在这种“持法太急”的风头上，“其锋不可犯，其势未可乘”，切不可“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”，拿鸡蛋往石头上碰；而应当“忍耐”，以避其“风”。元丰三年，因他写诗诋毁新法，影射神宗，被抓去坐了三个月班房，几乎掉了脑袋；只是由于革新派章惇等人为他转圜，才保住性命，被贬到黄州，给他“思过而自新”的机会。这时，他又本能地感觉到，在这种风头上，光“忍”是过不了关的，还必须进一步表示认错：“闭门思过，深悟积年之非”，表示服输；对革新派“顺适其意”，表示悔改：“求所以自新之方”。他在给章惇的信中，说自己反对变法的“过恶”非常大、非常多，以至弄到如今“追悔无路”；后悔当初不该“强狠自用”，不听劝告，简直是鬼迷心窍，并且赌咒发誓：按照我的罪行，本来是该杀头的，如果今后还不悔改，我苏轼还成个什么人呢（“案罪责情，固宜伏斧钺于两观，若不悔改者，轼真非人也”）？很有痛改前非、永不翻悔的“诚意”。

但是，顽固派大多是两面派，他们表示愿意悔改的“诺言”都是靠不住的，轻信不得的。就在苏轼给章惇写信赌咒发誓不久，他又偷偷地给顽固派头子文彦博写信，咒骂变法搞得他“死生未分”，表白反对变法的心迹至死不变。他还杀气腾腾地狂叫：“剑在床头

诗在手，不知谁作蛟龙吼”，随时准备向革新派疯狂反扑。元丰八年宋神宗一死，顽固派总头子司马光重新上台，实行“元祐更化”，全面废除王安石新法，排挤革新派。这时，苏轼也早已把自己的“诺言”忘得一干二净，以十倍的疯狂，百倍的仇恨，参与对新法的反攻倒算，对革新派大打出手。他颠倒是非，混淆黑白，捏造革新派的所谓“凶匪”和“奸回”，叫嚷与革新派势不两立，如同炭冰水火之“不可以一器”，“不可以共处”，极力主张对革新派严加惩处。连对曾经向之赌咒发誓并吹捧为“一代伟人”的章惇，他也不肯放过，极力怂恿司马光将其贬逐到遥远的偏僻处所，活现出一副翻案复辟派的凶相。

苏轼的这种“忍”与“吼”，即风头上假装认错服输，赌咒发誓，风头一过就搞翻案复辟、反攻倒算，反映了古今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顽固派的虚伪性和疯狂性。发明“小不忍则乱大谋”的孔老二是如此，他在卫国的匡城地方被造反群众批斗时，发誓不再来卫国捣乱；一旦脱身，又窜到京里去怂恿卫灵公赶紧派兵镇压匡城群众。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也是如此。文化大革命前，他伙同刘少奇推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，鼓吹“不管白猫黑猫，捉住老鼠就是好猫”的唯生产力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，反对社会主义革命，顽固地要走资本主义道路。文化大革命中，被群众揭发、批判，他做了检讨，承认自己是“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之一”，表示过愿意悔改，“永不翻案”。但是，“说是‘永不翻案’，靠不住啊。”他重新工作不久，就马上翻脸不认帐，俨然以“复辟派”、“还乡团”自诩，恶毒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，咬牙切齿地要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大打出手。他阴阳怪气地说：“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问题一概把它忘记，根本不要去想它，也不要提它了。我记性不好，都忘记了”。事实说明，他忘得一干二净的是“永不翻案”的诺言，记得一清二楚的是“白猫黑猫”一类宝贝，是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，复辟资本主义。

顽固派的“诺言”之不能算数，不能轻信，说明顽固派头子要改也难。这是由他们所代表的反动阶级或阶层的利益所决定的。但是，历来的顽固分子“实际上是顽而不固，顽到后来，就要变，变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。”孔丘、苏轼不就是这样的狗屎堆吗？邓小平拒绝毛主席的教育和挽救，抗拒群众的批判，不是已经变成对抗性矛盾了吗？一小撮制造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暴乱的反革命分子，不是叫嚣要抬出邓小平充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头子纳吉吗？顽固派的这类表演倒使我们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，原来他们“忍”是假象，“吼”才是本质。这就用得着鲁迅先生的一句名言：不要轻信了某种人的“痛哭流涕，即使眼角确有泪珠横流，也须检查他手巾上可浸着辣椒水或生姜汁”。切莫要轻信顽固派的赌咒发誓，谨防他们是为了蒙混过关而施展的“忍”术，更要警惕这“忍”字后面的那个“吼”字。